

# 原鄉或者他鄉：

## 由「山有多高」觀察二代外省人的離散與家鄉認同

宋惠中<sup>1</sup>

### 摘要

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

——鍾理和

「山有多高」<sup>2</sup>是導演湯湘竹的回家三部曲之一，也是湯導在身為人父之後，為他父親所拍的紀錄片。片中敘述了湯父與湯湘竹對於回歸原鄉的渴望及原鄉意義的探索。湯湘竹的名字裡隱含了父親的鄉愁，而且那是關於回不去的原鄉的鄉愁。

1949年百餘萬外省人播遷來臺，隨著兩岸分離，國共對峙，回家成了他們最遙不可及的夢。1987年解嚴以後，開放赴大陸探親，再回首，已然人事全非，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已改鬢毛衰，原鄉已非記憶中的故鄉。

如果每個人對生命源頭最初的記憶，也算是鄉愁的話，那我的鄉愁又在哪裡？跟著父親的鄉愁回到湖南，迎面而來的湘字，卻引不起我太大感覺，我轉身朝另外一個方向，腦中浮現出青青的山林之路，這讓我想起了最初的童年記憶……。這是湯湘竹對於鄉愁的探索。

本文擬由「山有多高」為起點，觀察二代外省人的離散與家鄉認同，討論外省第一代對於原鄉認同的變遷。並進而分析外省第二代與第一代的世代記憶與認同轉變。

**關鍵字：**山有多高、外省人、離散、認同、集體記憶

---

<sup>1</sup>元培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sup>2</sup>本文所引用文本：葉如芬（製片）、湯湘竹（導演）（2002）。**山有多高**。台北：公共電視。本片曾獲2002年金穗獎、優等紀錄片獎、2002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2002年台灣紀錄片雙年展評審團特別獎、2002年入圍亞洲電視獎紀錄片獎。

## 壹、影像作為一種紀錄方式：臺灣紀錄片影像中的老兵身影

電影從 1895 年誕生到現在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百餘年來，它以一種記錄現實的工具，而發展成爲一種表達人類思維與內在感情世界的媒介。時至今日，不論從電影工業技術的變化，影像作爲一種紀錄的方式；及影像成爲重構或建構集體記憶的載體已成爲可能。

紀錄片在近十餘年來蓬勃的發展，與社區營造、族群記憶、地方文史活動等相結合，形成特殊的文化活動。這些紀錄片多選擇站在「個人」的角度重新回頭書寫和紀錄在大歷史下的小人物，形成給予某些小眾發聲機會的「小敘事」(little narrative)，而這些「小敘事」，常常與強調歷史因果關係的「大敘事」(grand narrative) 不同，這給了以往失去歷史發言權的小人物也有作爲個體的歷史經驗和意義，讓我們有機會窺見深藏在人們生命中的血淚故事。因此，關於紀錄片的討論及論述，不僅僅是一種藝術的表現形式，而是文化現象的演繹，以及集體記憶的觀看方式。

1949 年國民政府撤退來臺，帶來了百餘萬流離的異鄉人，近年來他（她）們的故事也成爲影像紀錄片的焦點。最早關於外省老兵的紀錄片是 1965 年，陳耀圻導演所拍攝的「劉必稼」，這部影片是臺灣紀錄片史上第一部具觀察性紀錄片內涵的真實電影。片中的主角劉必稼是一個在 1940 年代在大陸農村被抓丁而隨國民政府來臺的軍人，他在退伍前到臺灣東部河川地，辛勤地挑石頭開闢田地。「劉必稼」紀錄片當年發表時，在臺灣藝文界引起很大的震撼<sup>3</sup>。

1996 年時，以拍攝紀錄片爲重心的吳乙峰導演的全景傳播基金會推出了紀錄片《陳才根的鄰居們》。這部影片記錄的是 1996 年之前，住在當時台北市 14、15 號公園預定地內違章建築區域中的七位老伯伯的故事。這一大片違章建築共住了有九百多戶人家，裡頭住了許多中下階層的小市民，以及許多俗稱的「榮民」、「外省老兵」，每個人因爲不同的狀況而擠居在這片雜亂的建築中。早期，這裡是日據時代的公墓，後來許多因爲戰爭而回不了家以及從軍隊中提早退役的人，開始在這裡以木板搭建房屋，就這樣住了下來。吳乙峰導演在拆遷之前，花了兩年時間記錄下他們在臺灣落地，但卻不知是否該生根的故事<sup>4</sup>。

2000 年，蕭菊貞導演以尋找祖母的「銀簪子」爲出發點，回溯他父親及其朋友的老兵故事。並出版了一本書《銀簪子：終究，我得回頭看見自己》述說自己在拍攝這部紀錄片的心路歷程以及種種突發事件。但本書的副標題「終究，我得回頭看見自己」，或許是日後許多「外省第二代」手拿攝影機拍攝自己父祖的最佳理由。

2002 年的「山有多高」是導演湯湘竹的回家三部曲之一，也是湯導在身爲

<sup>3</sup>《劉必稼》影片攝製完成的數十年後，胡台麗因從事榮民研究，在花蓮木瓜溪畔的一個農莊中驚喜地發現了劉必稼的身影，於是開始以攝影機紀錄這個由外省老兵，與他們來自台灣不同族群的妻子及兒女所組成的新移民聚落，完成一部《劉必稼》影片的續集——《石頭夢》。

<sup>4</sup>吳乙峰（導演）（2006）。《全景紀錄片：陳才根的鄰居們》。台北：公共電視發行。

人父之後，為他父親所拍的紀錄片。片中敘述了湯父與湯湘竹對於回歸原鄉的渴望及原鄉意義的探索。湯湘竹的名字裡隱含了他父親的鄉愁，而且那是關於回不去的原鄉的鄉愁。本片由前一部紀錄片《海有多深》的胎兒影像作為敘事的起點，由於父親突然中風，不得不讓他正視生命的源頭。生命的源頭來自何處？對湯湘竹來說，父親為他取的名字似乎已揭示了答案，也包含許多暗示和期待，扛著沉重卻難以言說的情感。「湘」，是父親老家湖南的簡稱，而「竹」指的是新竹尖石鄉，是父親來臺後的家，也是湯湘竹的出生地，「湘竹」意指湖南人在新竹出生的，湯湘竹說：「我的名字結合著父親的鄉愁。」

此後，因應各地眷村改建的浪潮，以紀錄片的形式刻畫老兵或眷村身影，似乎蔚為風潮。如 2007 年，製作人王偉忠所拍攝的《偉忠媽媽的眷村》一片，紀錄嘉義建國二村改建前的種種<sup>5</sup>。2008 年開始，外省臺灣人協會舉辦「榮光眷影」紀錄片人材培訓課程，使更多非專業的素人紀錄片展現在我們面前。如陳心怡的《被俘虜的人生》紀錄古寧頭戰役後被俘虜的共軍戰俘，在臺隱姓埋名過一生的故事。《一人三坪六十年》紀錄公館芳蘭山莊空軍退員宿舍老兵的生活。《夢痕》的導演陳一芸，記錄父母親的日常生活，就像翻開家庭相簿般細數著自己的家庭史。在各地的眷村改建浪潮中，為自己將消逝的「家」留下紀錄，而產生了許多關於各地眷村的影像與文本（高有智，2011）<sup>6</sup>。

由以上的敘述可知以影像作為一種記錄的方式，在記錄老兵身影上，已有相當的文本可提供分析與討論，本文擬由「山有多高」為起點，觀察二代外省人的離散與家鄉認同，討論外省第一代對於原鄉認同的變遷。並進而分析外省第二代與第一代的世代記憶與認同轉變。

## 貳、流離與鄉愁：外省第一代的家國情愁

### 一、戰爭經驗與流離記憶：離家

1949 年國民黨政權撤退來臺，在國共內戰的大撤退中有許多老兵就這樣隨著國民政府的軍隊來到臺灣，這些老兵當年各有不同的來源，有黃埔出身的嫡系子弟兵，有懵懂無知的少年兵，有各地征兵抓丁而來的民伕。（王德威，2004: 11；龍應台，2009）但他們始終懷著反攻大陸的夢想，希望有一天能夠再度回到家鄉去，沒想到再也無法回去了。這些「外」省人的身分，標誌著空間上無所著附的

<sup>5</sup>王偉忠（導演）（2007）。**偉忠媽媽的眷村**。台北：天下文化。

<sup>6</sup>這一類以眷村文化為主的紀錄可參見，高有智（2011）。眷村文化保存工作者群像。載於張翰璧（主編），**扶桑花與家園想像**。台北：群學。除了因為眷改議題引起社會普遍觀著外，眷村文化的保存的另一個脈絡與一九九〇年代文建會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有關，1998 年省文化處推動大家來寫村史運動，在眷村類別中選擇台北縣中和安邦新村為種子，吳密察等（編）（1999）。**村史運動的萌芽**。台北：唐山。蔡筱君等（編）（2002）。**閱讀安邦新村：一路行來的眷村巷弄生命記事**。台北：竹籬笆工作室。

游離——外於臺灣，也外於大陸上的家園故土。（梅家玲，2006: 12）。想家與鄉愁成爲老兵無以承受的重，余光中的〈鄉愁〉訴說著他們對家鄉的依戀。

小時侯，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  
長大後，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我在這頭，新娘在那頭；  
後來啊，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我在外頭，母親在裡頭；  
而現在，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

追隨國府而至臺灣的外省人其實並非是一個和諧的整體<sup>7</sup>，這些總數約一百餘萬的新移民，既來自四面八方，內部當然也有他們的省籍問題。這些人與臺灣原有的族群語言習慣不同，且多數分布在各類軍公教體系的眷屬聚落當中。更重要的是近代中國的國難和流離經驗，以及國民政府所謂的中國國族主義成爲他們的集體記憶。

其實外省人只是對應於本省人的一組概念。國民政府撤退來臺之前，並沒有「外省人」此一特定族群的存在。撤退來臺時，在「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下臺灣只是臨時的避難所或復興基地。因此，外省人的群體意識，是來臺灣後共同生活經驗的累積。特別是眷村的生活空間，提供外省人蘊釀我群意識的重要條件。（參閱李廣均，1996: 367-390；柴雅珍，1997）

而這些族群經驗是藉由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和結構性遺忘（structural amnesia）相互作用的結果。Maurice Halbwachs 曾指出人類的記憶是一種集體社會行爲，每一種集體記憶皆有其相對應的社會群體。爲了強調某一種社會的凝聚，該社會人群不斷以某種媒介（包括文物、文字或儀式）來重覆強調此一集體記憶（Halbwachs，1992）<sup>8</sup>。Hobsbawm 也強調過去的集體記憶如何被重覆強調，以維繫社會人群的凝聚（Hobsbawm，1983）。

## 二、家與故鄉：成家與想家

### （一）臺灣的家

遷臺初期外省人在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下，期待返鄉／復國的心態，隨著政治軍事情勢的演變，及個人生活經驗的變遷也逐漸產生變化。1950 年頒布的《勘亂時期軍人婚姻條例》限制滿 28 歲的軍官及技術士官才能結婚，並在全國設立近千個眷村，（郭冠麟主編，2005: 7）藉以安置大量移入的外省人，這二項政策，都對外省人的家與故鄉認同產生重大的影響。1959

<sup>7</sup>在臺灣一般人的觀念中，外省人給人的刻板印象也有「外省權貴」和「老芋仔」二個完全不一致的社會意像，「老芋仔」最初是臺灣兵入伍後與外省兵接觸後產生的，基本上是低階外省士官兵的代名詞，以後變成老榮民甚至外省人的代稱。參見（胡台麗，1990）。

<sup>8</sup>台灣 1990 年代以降所強調的社區總體營造和村史運動即不斷的以某種媒介（包括老照片、日記或文物和家譜）重塑地方的歷史。關於其中一些操作方式的討論參考見尤力·阿冒等撰（1998）。**大家來寫村史**。台北：唐山。

年政府放寬軍人婚姻限制，但距國府來臺，已經十年了，許多青年軍人已步入中年。而眷村也成為日後凝聚外省人文化的重要堡壘。成了家有了第二代的，成為開臺一世祖。一代人歸鄉之路的灰飛煙滅，造就另一代人的靈根自植。（王德威，2004: 13）

當然，不是所有的老兵在臺灣都成「家」立業，成了家的才有二代外省人的認同與鄉愁可言。未成家或沒有進入眷村體系的老兵，多數進入榮家或在外自謀生活。（林勝偉，2003）「銀簪子」片中，蕭父的朋友多數是居於屏東榮家的老榮民，透過「往事重述」的方式讓榮家的老兵敘說創傷經驗，來表現老兵的流離，訴說自己的故事。片中的榮民之家，彷彿是軍營的再現，老人吃飯穿著有如幼稚園小朋友般同色系的圍兜，相同的餐具。廖如芬的觀察，榮家的每位榮民就彷彿一顆顆孤立的星球，在各自的軌道上運轉，彼此沒什麼交集，而無家可歸的失落感總會不經意的出現在他們的言談中，因為榮家的「家」僅是家屋，而不是「家」。（廖如芬，2010: 72）。老兵不死，只是在榮「家」漸漸凋零。

眷村與榮家外的流離老兵，更生活在社會的底層，在《陳才根的鄰居們》影片中導演不斷地追問每個人的婚姻狀態，是否在臺灣有結婚？在大陸的妻子有改嫁嗎？關於「家」（家庭、家鄉）的認同，在他們身上有了另一層含意。就靠著這些老榮民彼此相互的扶持，日久他鄉是故鄉，就靠著相濡以沫的情感，幾位鄰居們竟組成了一個這麼特殊的家。這類的老兵多處在社會邊緣位置，吳明季更指出老兵的三重失落的話語：1. 處在與瘋子、白癡、腐敗垃圾為伍的癡癩屬性歸類；2. 流亡經驗；3. 老人失落處境，用死寂與沉默在社會的角落訴說自己的故事。（吳明季，2010: 45）

## （二）近鄉情怯：他鄉或是故鄉

在「山有多高」中湯湘竹與父親兩代其實對於原鄉有著完全不同的想像。湖南是父親的原鄉，是午夜夢迴魂縈夢牽的地方，對湯父而言那是父母埋骨之所。片中湯父告訴湯湘竹，爺爺過逝時若知道，時在金門的他會從金門跑回老家。回家探親的心願則是在「在清明節的那一天，回大陸掃墓，幫家裡掃墓。」探親與回鄉掃墓，似乎成了所有老兵的共同願望。一封封無法寄達的家書，訴說著無盡的思念，回家的路遙遠而漫長。（外省臺灣人協會，2006）

《山有多高》透露著個人際遇與大歷史的相脈關係。在不幸、遺憾之外，更多的事是當事者的不願與不想再提的。「你昨天回到老家覺得怎麼樣？」父親說；「人都不認識了……都變了好不好」；「會想再回去嗎？」父親搖搖頭：「根本不像老家了，老家的房子都沒有了。」當原鄉不再是記憶裡的模樣，日久他鄉會是故鄉嗎？鍾理和在原鄉人中提到：「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鍾理和）但回鄉之後呢。

《陳才根的鄰居們》中，許多老兵在 1987 年開放探親之後，先後回大陸許多次，被問到老家的狀況時有人感嘆著：「那裡的生活我過不慣，在這邊（臺灣）是外省人，回去（大陸）了也是外省人。」

蕭菊貞的「銀簪子」導演的問父執輩的老榮民：「你想回去嗎？」「不想。人家表面上歡迎，內心不歡迎。」也有說「想回家看看，可是家已經找不到了。」

思念——在海的那一邊，歷史的錯誤扭曲了多少人的一生，戰士不能榮歸故里。家、歸不得、不可求！

——「銀簪子」紀錄片結語

## 參、故鄉或他鄉：外省第二代的原鄉情懷

### 一、原鄉或故鄉

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來臺，不僅帶來了百餘萬流離的異鄉人，也將近代中國的民族文化與國族想像帶入臺灣。<sup>9</sup>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及隨之而來的清鄉和白色恐怖，韓戰後的美國的經軍援助，1954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及49年中央民意機構遷臺的法統的延續。確立了國民政府對臺灣統治的基礎。戰後初期國家機器對社會的嚴密監控和威權統治、制式教育與言論控制，使1950至60年代成長的第二代外省人只能依國民黨的文宣與教育，來瞭解中國和臺灣的過去。

對戰後第二代的「外省人」而言，其實對中國的歷史現實隔閡，並不表示他們欠缺歷史感，他們的歷史感來自於從小所接觸的國族論述。就外省籍的戰後世代而言，他們多數在臺出生可能並無實際的流亡經驗，但自幼來自於父祖的流離經驗，及學校和社會所灌輸的國族敘事，都使他們有深切的流離心態。許多人都是「瞪著身分證上的籍貫欄嚷著懷鄉的」<sup>10</sup>。隨著時間推移，第二代的外省人愈發覺得和他人不盡相同「原因無他，清明節的時候，他們並無墳可上」……「原來，沒有親人死去的土地，是無法叫做家鄉的。」，「得以返鄉探親的那一刻，才發現在僅存的親族眼中，原來自己是臺胞、是臺灣人，而回到活了40年的島上，又動輒被指為『你們外省人』，他們遲早會在伊索寓言故事裡發現，自己正如那只徘徊于鳥類獸類之間的，無可歸屬的蝙蝠。」（朱天心，1992）

《山有多高》的湯湘竹說父親幫我取名叫湘竹，是湖南人在新竹出生的意思。這樣的例子在臺灣的外省第二代中並不少見，許多人的名字都帶有父親的鄉愁，不然就是台生、澎生等流離似的名字，這似乎意味著外省第二代特殊的流離

<sup>9</sup>關於晚清以來中國的國族建構與國族想像可參考沈松橋的相關研究，見沈松橋(1997)。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的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8，1-77；沈松橋(2000)。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77-158；沈松橋(2006)。江山如此多嬌——1930年代的西北旅行書寫與國族想像。《臺大歷史學報》，37，145-216。從戰後臺灣已出版的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分類來看，戰後臺灣社會記憶的回憶對象以男性、外省人為主要，對本省人的回憶以1990年以後較顯著增長。見(王明珂，1995)。

<sup>10</sup>龍應台(2010年8月9日)。文明的力量：從鄉愁到美麗島。《聯合報》。文中也描述了1970至80年代初期臺灣青年「中國夢」的轉化過程。

心態。鄉愁的記憶與傳承，在他們的身上隨處可見。許多外省第二代是在陪父母探親的過程中才來到陌生又熟悉的原鄉。當然，外省第二代來說探親多少具有家族傳承的意謂。湯湘竹父親的中風與新生兒的誕生幾乎是同一時間發生，「紀錄」成爲使命（擔心孫子看不到爺爺），也成爲人子（導演）心中潛藏的焦慮，因而有陪父親返鄉探親的情節。（范宜如，2009: 118）湯湘竹自陳：「當我抱起自己的孩子，才終於瞭解父親的心，我決定只要父親能動，就帶他回老家。」傳承的意味十足。

## 二、家的記憶與認同

外省第二代（尤其是與本省籍婦女通婚的第二代）對於家的認知，常處於幻影與真實之間。父祖的故鄉是家，常在父親的口中、書本上及自我想像中出現。母親的娘家也是家，可能是每年過年回去的地方，是最早與其他族群接觸的地方；所居住的眷村當然是家，是個人從小生長的地方。眷村子弟苦苓說：「嚴格的說，我有三個家鄉：一個是熱河省林東縣，……第二個家鄉是宜蘭，母親生長的地方……，第三個家鄉便是新竹的湖口（眷村）……。」（青夷編，1993: 157-158）。事實上，眷村生活可能才是他們最初的記憶，而這些記憶在後眷村時代多數已成爲回憶。（黃淑俐，2008: 222）張啓疆也指出：「眷村已經過去，新的生活必須面對，但生命的根永遠繫於人性與血緣；它會隨著我們前進的腳步紮向更深，穿越已經歷的和未來臨的苦難與甜美的歲月。」（青夷編，1993）

齊邦媛指出：在眷村長大的第二代，除了身份證上本籍欄內填著父親的家鄉外，內心對河南、山東、遼寧、湖南、四川……這些遙遠的地名，毫無思之落淚的感動。父母當年辭別的家鄉，對他們來說，只是個地名。即使有回去的一天，也不知向誰去認祖歸宗。生長在加速繁華的臺灣，他們年輕的生命沒有苦難和憂患意識。熱熱鬧鬧的升學競爭、友情、愛情、婚姻、事業理想……占滿了思考的空間，倒是面對即將拆遷和村口被砍的大樹時，錯綜複雜的童年記憶令他們惆悵徬徨。這是軍人的二度辭鄉。（齊邦媛，1998: 154）因此，眷村改建是二代外省人的重層流離經驗。

## 三、生命經驗與鄉愁

當然也有許多外省人，並不是居於眷村之中，湯湘竹即是一例。「山有多高」的片中湯湘竹說到：如果每個人對生命源頭最初的記憶，也算是鄉愁的話，那我的鄉愁又在哪裡？「但跟著父親的鄉愁回到湖南，迎面而來的湘字，卻引不起我太大感覺，我轉身朝另外一個方向，腦中浮現出青青的山林之路，這讓我想起了最初的童年記憶。」湯父於八二三砲戰受傷後轉任警察，服務於新竹尖石的山區，因此他從小生活於新竹尖石，對於山地小學秀巒國小路跑隊的原住民小孩有特別的親切感。因此《山有多高》的 VHS 版本是採三條敘事軸線進行，除了父親中風後的返鄉之旅、兒子小樂的出生和成長，還加上尖石鄉秀巒國小路跑隊的訓練及比賽情境。湯湘竹說：「秀巒，像極了我童年記憶中的尖石，這裡的孩子有我

熟悉的氣味。」<sup>11</sup>片中湯湘竹與父親重遊尖石，到了即將拆除改建的尖石分駐所「圳溝還在，泥鰍也有」尖石似乎才有他的生命記憶。湯導自言：「童年景像已不復在。尖石對父親而言，只不過是漫長人生中的一個驛站，對我而言，卻是生命記憶的源頭。」湯湘竹對於「故鄉」的陌生，對於尖石的親切，當然與他的生命經驗緊緊相扣。

## 肆、(代) 結語

過去十年來臺灣內部與兩岸經常處於政治對立狀態，使「身分認同」這個詞彙在臺灣社會當中既被廣泛討論，又被窄化成「臺灣人／中國人」、「統／獨」、「藍／綠」等二元對立選項的「政治認同」範圍內。其實「身分認同」與「政治認同」是可以不必然相等的。

近年來的眷村熱和對於老兵的紀錄的搶救運動，都是在後眷村時代紀錄一種逝去的文化。老兵不死，只是凋零，當凋零殆盡，還能留下些什麼？《山有多高》是回家三部曲之二，藉由父親的「回家」，一層一層撥開離散與鄉愁，去發現家在何方，每個人生命記憶的源頭，會展現對生命與土地的關懷，是這一部片最珍貴和重要的價值。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1949 隨國府來臺的百餘萬「外省族群」，對於臺灣這塊土地文化的豐富性，是饒有貢獻的。就像遼耀東教授指出「川味牛肉麵」等小吃發明自於臺灣，其間融合外省族群的各地特色，和而不同，豐富了我們的生活，也帶給我們新的集體記憶。

---

<sup>11</sup>DVD出版時刪除關於秀巒國小路跑隊以及江彼得的親子故事，然而片尾的致謝字幕中仍出現相關人物。因此初次看這部影片時感到一頭霧水。湯湘竹也自陳：「我小時候大概兩歲就搬到了新竹尖石鄉，屬於山地部落，當初片子有三分之一的線是在那個山上，那是我的童年記憶，但是那一段後來被我全部幾乎都剪光了，因為我也覺得那一段做的非常不好。」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文獻

- 王甫昌 (2004)。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
- 王德威 (2004)。老去空留渡海心。載於王德威、齊邦媛 (編)，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台北：麥田。
- 外省台灣人協會策畫，姜思章等著 (2006)。流離記意：無法寄達的家書。台北：印刻出版公司。
- 朱天心 (1992)。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台北：麥田。
- 林平 (2010)。家鄉中的異客——新移民的雙重困境。張茂桂 (主編)，國家與認同：一些外省人的觀點。台北：群學。
- 林勝偉 (2003)。從「戰士」到「榮民」：國家的制度建構與人口類屬的形塑 (1949~1970)。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5，1-56。
- 吳明季 (2010)。三重失落的話語：花蓮外省老兵的流亡處境及其論述。載於李廣均 (編)，離與苦：戰爭的延續。台北：群學。
- 青夷 (編) (1993)。我從眷村來。台北：希代。
- 姜思章等 (2006)。流離記憶——無法寄達的家書。台北：印刻。
- 胡台麗 (1993)。芋仔與番薯：台灣「榮民」的族群關係與認同。載於張茂桂 (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
- 范宜如 (2009)。個人記憶·家國敘事：紀錄片《銀簪子》、《山有多高》的影像詮釋與意義論述。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2，111-134。
- 孫鴻業 (2001)。汗名、自我、與歷史：台灣外省人第二代的身份與認同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新竹。
- 桑品載 (2001)。岸與岸。台北：爾雅。
- 柴雅珍 (1997)。戰後台灣外省人的塑造與變遷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台中。
- 梅家玲 (2006)。曾經的滄桑。載於外省台灣人協會策畫，姜思章等著，流離記意：無法寄達的家書。台北：印刻。
- 郭冠麟 (主編) (2005)。從竹籬笆到高樓大廈的故事：國軍眷村發展史。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 黃克全 (2006)。兩百個玩笑：給那些遭時代與命運嘲弄的老兵。台北：爾雅。
- 黃淑俐 (2008)。再現·流亡的孤軍——桃園縣忠貞新村集體生活聚落瓦解過程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中原大學建築學系。桃園。
- 廖如芬 (2011)。流離、返家與回「家」。載於李廣均 (主編)，離與苦：戰爭的延續。台北：群學。
- 趙彥寧 (2002)。家國語言的公開秘密：試論下階層中國流亡者自我敘事的物質性。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6，45-85。

- 趙彥寧（1995）。戴著草帽到處去旅行——性／別、權力、國家。台北：巨流。
- 趙剛、侯念祖（1995）。認同政治的羔羊：父權體制與論述下的眷村女性。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9，125-63。
- 齊邦媛、王德威（編）（2004）。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台北：麥田。
- 齊邦媛（1998）。當霧漸漸散的時候。台北：九歌。
- 龍應台（2009）。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台北：天下文化。
- 蕭菊貞（2001）。銀簪子／終究，我得回頭看自己。台北：時報文化。
- 薛繼光等（2008）。鄉關處處——外省人返鄉探親照片故事書。台北：印刻。

## 二、網路或其他影音資料

- 王偉忠（導演）（2007）。偉忠媽媽的眷村。台北：天下文化。
- 吳乙峰（導演）（2006）。全景紀錄片：陳才根的鄰居們。台北：公共電視發行。
- 胡台麗（製片、導演）（2005）。石頭夢 **Stone Dream**。台北：獨立製片。
- 蕭菊貞（導演）（2000）。銀簪子 **Grandma's Hairpin**。台北：舞影工作室。